

【上卷】

董輔初 主編

# 中華人民共和國 經濟史

【上卷】

董輔初 主編

# 中華人民共和國 經濟史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謝寶笙

封面設計 彭若東

書 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  
主 編 董輔初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新豐柯式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二十號801室  
版 次 2001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開(187×245mm) 624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1967 . 7

©200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原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本店徵得  
原出版者同意在香港出版繁體字本。

## 前言

經濟史既是史學中的一門專史學科，也是經濟學的一門基礎性學科。在歷史學和經濟學的研究中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原理，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來說是一般性的常識。但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是很寬泛的範疇，因而，在按照時序考察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運動時就要選擇適當的切入點以及把握研究與描述的主線。

經濟史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綜合活動為研究對象。一方面，任何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基礎都是經濟在量上的增長，即實現經濟增長。但這還不是一切。縮小收入的差別，消滅貧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行戰略轉換，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等歸結為經濟發展的問題對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更為重要，因此，經濟發展是近代社會人們格外關注的問題。經濟發展包含着經濟增長，它以經濟增長為基礎促進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作為生產關係範疇的經濟體制不但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且它對生產力發展的反作用時時以動力或源泉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們在本書是以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變遷為研究的主線：從生產力的角度着重考察經濟發展問題，即不但包括經濟的量的增長也包括質的提高；從生產關係的角度着重考察經濟體制的變遷即經濟體制的形成、確立、調整、改革和創新。

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對過去的關心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自覺地選擇明天。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研究的目的、意義以及重要性自不待言。這裡僅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的分期問題作一些說明，這也是我們本書研究與寫作的脈絡。

### 一

經濟史是以時序的形式考察和描述經濟發展與經濟體制變遷，在這一過程中，又可以根據一定的標準劃分為不同的時期或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由於諸多因素，社會發展表現出曲折與複雜性。由於選擇的依據和標準不同，因而時期

或階段的劃分也不相同。我們在本書採取的劃分時期的基本依據是：

第一，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經濟發展戰略的確立與轉變。歷史的奇妙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客觀必然的過程，又是一個由人參與、由人選擇的過程。當時的決策在今天看來可能是正確，也可能是錯誤，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雖然不能否認個人在歷史轉折關頭的關鍵性的作用，但絕不能單純用某個人的英明或失誤來解釋，因為一個決策能夠成為社會的行動，肯定有它的社會基礎。經濟史研究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對這些給出合理的解釋。

第二，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形成、確立、調整、改革與創新的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經濟體制就處於整個社會不斷變革的核心地位，它既決定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性質，又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在各個時期有若干種選擇的可能性，從歷史的角度回顧顯然應該有更好的選擇，但現實的選擇一定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今天我們還不能給予令人信服的解釋，正是說明我們還沒有把握到歷史發展的真正脈絡。這也正是經濟史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的研究中對經濟體制的變遷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因此，經濟體制變遷也就成為劃分時期或階段的重要依據。

第三，經濟發展過程中從宏觀經濟的角度表現出恢復、增長、躍進、調整、蕭條、危機等帶有周期性特點的運動，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變動。無論選擇什麼樣的經濟指標，描繪出的經濟運行的狀態都會是一條波動的軌跡。按照一定的標準在不同的時點上截取的區間，在發展過程中就是不同的時期或階段。

綜合地運用上述經濟史分期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時期。

從1949年到1976年為一個大的時期，構成了本書上卷的內容。這一時期在生產力方面着重解決的是經濟增長問題，生產關係方面是以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與確立為主要內容。從1976年到1999年為又一個大的時期，構成了本書下卷的內容。這一時期在生產力方面轉向以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為重點，生產關係方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要內容。

這兩個時期有各自的特徵或者說有明顯的區別：

第一，從經濟增長方式的角度看。前一個時期着重於經濟增長，特別強調社會物質產品數量的增加，產值的增長。因而在經濟建設中，採取典型的外延擴大再生產的方式。後一個時期開始轉向注重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益，產值不再作為最主要的統計指標，經濟增長方式開始由粗放型為主向集約型為主轉變。

第二，從經濟結構角度看。前一個時期農業生產強調以糧為綱，突出糧食生產；工業生產強調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重工業的建設與發展得到極為高度的重視，重工業的發展又是以基礎原材料工業為主，輕工業的發展則受到輕視與排擠。因此，重工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地區結構上向內地傾斜。後一個時期農業生產轉向全面發展，種植業中的經濟作物無論是播種面積還是產量都大幅度增長；工業生產開始加大對輕工業的投資，加快輕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發展的重心轉向基礎工業；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極為迅速，拉大了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

第三，從經濟運行角度看。前一個時期經濟起伏非常大，受政治運動的干擾影響很大也很明顯。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波動減小，政治運動因素的影響也大大減弱。

第四，從經濟體制的角度看。前一個時期是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同時開始新的經濟體制建立的過程，新的經濟體制在政府、企業和個人經濟行為的決策上都表現為日益集中的趨向。因此，總體上說這一時期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確立與強化時期。其間雖然也進行了經濟體制的調整與改革，但由於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沒有深刻的認識，更是由於理論上把計劃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經濟特徵，因而調整與改革是在加強計劃經濟體制的總體框架內進行，主要是圍繞如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管理權限。

後一個時期是經濟體制改革與創新時期。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弊端日益阻礙生產力發展，因而成為了改革的對象。改革是從小心翼翼地擴大企業與地方的權力，增加市場調節的作用，改進計劃調節的手段與方式起步並且沿着這一趨向不斷發展與深化。量的變化終會引起質的飛躍。當理論深化到不再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確立了主導的地位。

第五，從分配和消費的角度看。前一個時期強調公平，因而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十分鮮明，人們的收入增長非常緩慢，而且差距趨向於縮小；由於消費品供應緊張，不得不採取票證供應的辦法，從整個社會來說，基本上處於維持生存消費的層次，人們在消費上的選擇餘地很小。後一個時期分配上開始轉向個人能力與表現傾斜，因而人們的收入增長加快；個人分配的原則突出效率，對公平加入新的理解，人們收入的差距在不斷增大；消費品供應日益充足，人們的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生存消費基本得以解決，開始進入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的層次。

經濟史關於時期劃分的時間表述上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採取不重疊、不交

叉的方法，如第一個時期的起止時間是1949年～1956年，第二個時期的起止時間是1957年～1965年，第三個時期的起止時間是1966年～1976年等等。另一種是採取重疊、交叉的方法，即每一個時期的終止年就是下一個時期的開始年，如第一個時期為1949年～1956年，第二個時期為1956年～1966年等。

前一種表示方法讓人們感覺經濟史的分期是以年底、年初為起始時間。以年度劃分在利用統計資料上非常方便，但上一年的12月31日和下一年的1月1日只是曆法上的分期，大多數情況下這一時刻的經濟發展與其他日子一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經濟史的分期一般是以重大的事件為標誌，而這些事件可能發生在一年中的任意一天。因此，以年度分期會出現割斷歷史的問題。

以重大歷史事件為標誌確實可以精確到月或者日，採用第二種重疊的方法就蘊涵着經濟史的分期發生在這一年之中。但是，以定性為主的理論研究更需要從宏觀的角度和總的趨勢去把握。重大的歷史事件表現的是事物的質變，而在這之前新事物有一段醞釀、發展的過程，這之後在新事物的推進、擴散時，舊事物又會以其慣性維持一段時期。因此，採用重疊交叉的方法較符合歷史的發展，也避免在研究中出現歷史的空白點。

本書在分期時採用的是第二種方法。

## 二

每一個大的時期中又可以劃分為若干個小的時期或階段。在前一個時期可以劃分為三個小的時期，分別成為本書上卷的三編：

第一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1949年～1956年）

第二編：開始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6年～1966年）

第三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1976年）

每一個時期劃分的具體依據如下：

### 1. 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

毛澤東1939年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就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革命勝利以後建立的社會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並全面具體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徵。1947年，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提出：“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

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綱領。”〔1〕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中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作了完整的概括：“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2〕

中國共產黨根據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綱領和政策，通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成為社會各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贊同的建國方略。

新中國建立之時即開始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很快又開始進行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民族資本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應該說，在實踐中貫徹着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綱領，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但是，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中國共產黨從來都公開宣稱它的前途和方向是社會主義，民族資產階級也非常清楚這一點。因此，在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同時，就在向着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許多管理方式和方法開始實施，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形成。

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村合作化變土地的個體所有為集體所有，隨之進行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消滅了私人資本和個體經濟，整個社會的生產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1956年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即是說，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與此同時，計劃經濟體制也基本確立起來了。

這一時期的基本特點是：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實現，消除了百多年來舊中國貧窮落後、受人欺凌的根源，創造了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的世界奇跡。

第二，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戰略，在迅速恢復遭受長期戰爭破壞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上，進行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第三，提出並實施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

〔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1253。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1433。

造，基本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即是說把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多種經濟成份基本上改造為公有制形式，其中全民所有制又成為最主要的形式。

第四，計劃經濟體制在組織結構、管理的程序和方式方法方面基本建立健全起來，通過對經濟運行管理與控制已經充分表現出高度集中統一的特徵。

對這一時期的下限有1956年和1957年兩種觀點。把下限劃到1957年的主要理由是“一五”計劃結束於1957年，1958年開始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並且開始了“大躍進”運動。

1956年9月，中共召開八大。中共八大宣佈已經取得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的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因此，中共八大提出：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已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中共八大可以說是時期劃分的重要標誌，它標誌着新民主主義的結束，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同時，也標誌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開始。

從生產力角度看，1956年基本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指標，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物質基礎也初步建立起來了。

經濟史上對於“大躍進”運動的研究絕對不可以忽略。但“大躍進”運動醞釀於1956年的反冒進、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發動於1958年初，它的高潮只持續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大躍進”運動只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特殊的階段。

因此，本書把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同時也是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開端劃在了1956年。

## 2. 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1956年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看到社會主義改造進展速度加快，就已經預見到將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結束，因而召開一系列會議，毛澤東並發表了《論十大關係》，開始研究和闡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由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整個社會洋溢着十分樂觀的氣氛。廣大人民羣衆要求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願望極為迫切，這些強化了決策者們通過羣衆運動方式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心。“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充分表現出人民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的極大熱情。但是，決策的根本性錯誤，以及實

踐中很多錯誤的、甚至違反常識的做法受到了經濟規律的懲罰，出現嚴重的危機，因而不得不進行經濟調整。這次經濟調整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第一次從宏觀角度採取的反危機措施。

這一時期的基本特點是：

第一，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已轉移到加快生產力的發展方面上來，經濟增長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點。

第二，這是經濟波動最大的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和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內。

第三，在產業結構上，把發展鋼鐵工業突出到了絕對的地位。

第四，初步認識到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提出並進行了改革經濟體制的工作。

第五，這一時期開展了反右派、反右傾的鬥爭，這兩次政治運動沒有給已經開始走向過熱的經濟降溫，反而火上加油。1960年代初期又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政治運動使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中“左”的錯誤不斷發展，對經濟不平衡發展的負面影響不斷增大。

這一時期的下限劃在了1966年6月份。1960年代初期開始的四清運動實際上就已經開始醞釀着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間又經歷了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和作出《五·一六通知》。當時批判主要在文化和理論領域上，政治鬥爭還是中共中央高層的活動，對1966年上半年的經濟運行沒有產生直接的重大影響。1966年6月份開始，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使經濟運行陷入一片混亂。自此，中國的歷史和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 3. “文化大革命”時期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運動，用它作為經濟史分期似乎顯得不協調。但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以致於一提“文化大革命”就能夠清楚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的這一段歷史。

這一時期的基本特點是：

第一，政治運動是一切活動的中心，支配了經濟運行。政治鬥爭打破了整個社會秩序，全國陷入一片混亂。經濟運行是在政治鬥爭的支配下，在混亂中艱難地進行。

第二，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口號下，嚴厲地批判和限制商品關係，市場因素處於幾近滅絕的地步。

第三，在備戰的指導下，進行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內地建設，改變了區域經濟的佈局。

第四，“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最為劇烈的經濟體制的變動和最大規模的機構精簡，生產管理也遭到嚴重的破壞。但是，由於越是危機時刻越是需要集中，因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混亂的經濟秩序中反而得到強化。

### 三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成為本書下卷的三編。

第一編：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階段（1976年～1984年）

第二編：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階段（1984年～1992年）

第三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年～1999年）

所謂“時期”和“階段”的本意都是指對事物發展過程按一定的標準進行的劃分，二者的差別主要表現在同時使用時，時期包括了階段，而不是相反。人們習慣上把1949年～1975年的三個“階段”稱之為“時期”，是由於這三個階段具有較明顯的獨立性可以獨立為三個時期。而由1976年～1999年後一個時期則不同，其中的三個階段緊密銜接，統一於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之中，因而只宜劃分為階段，而不宜獨立為時期。

#### 1. 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階段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恢復社會秩序、加快經濟發展成為全社會強烈的要求，經濟發展碰到的首要障礙就是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多年的宣傳教育以及這一經濟體制曾經起到了改變舊中國落後狀況的輝煌成就，計劃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的認識深入人心。改革計劃經濟體制還沒有成為社會普遍的清醒認識。

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是：

第一，全國和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經濟增長問題重新成為社會的焦點。

第二，農村進行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充分表現出經濟體制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巨大作用。農業的全面豐收，不但使中國人民擺脫了生存的威脅，而且拉動了經濟的全面增長。

第三，經濟結構出現輕型化，消費資料生產在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扶持下迅速增長。區域經濟結構開始向沿海省份傾斜，沿海省份與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開始拉大。

第四，從根本上改變了與世界市場隔絕的狀況，開始了對外開放的進程。

第五，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處於研究、爭論、試點的探索過程中，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求與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交織在一起。

第六，市場因素在不斷加大。

這一階段劃分需要說明的問題是1976年10月到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兩年多的時間劃分在哪裡。

經濟史對這一時間的劃分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指導思想上仍然延續“左”的錯誤，在經濟建設中急於求成，也沒有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餘波，因而劃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新時期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誌。另一種觀點認為應劃入新的歷史時期。本書持後一種觀點。

對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為標誌，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十一屆六中全會已有定論。《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這兩年多的時間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一方面由於歷史的巨大慣性，一些“左”的東西仍然在起作用；另一方面許多新的東西在成長，這與“文化大革命”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上還在強調階級鬥爭，但階級鬥爭的矛頭和對象不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揭發、批判和清查“四人幫”集團。這項工作為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宣佈結束“文化大革命”，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羣衆運動，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打下了基礎。

第二，中央工作的重心已經開始轉向經濟建設。在“抓綱治國”、“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口號下，從1976年12月起召開了一系列全國性的會議，如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工業學大慶會議、中國科學院工作會議、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以及煤炭、鐵路、財政金融、冶金、供銷、交通、棉花生產、地質、外貿、郵電、農田基本建設、建築材料、測繪、銀行、電子、電力、氣象等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對“文化大

革命”中被破壞的經濟秩序進行全面整頓與恢復。

1978年9月召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會議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的科學管理軌道上來；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的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利用外國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

第三，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探索開始活躍，報紙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在批判“四人幫”的旗子下，對“左”的經濟理論和觀點進行批判，提出了許多在今天看來可能還是比較不成熟、但在當時卻是有很大突破的思想。

不但理論工作者在進行探索，實際工作者在管理與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也在注意解決經濟理論問題。如1977年3月召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會議針對經濟理論與政策上存在的混亂狀況，提出了：企業必須以生產為主，各項工作要圍繞生產進行，決不能再沿用“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做法；必須理直氣壯地抓企業管理，不能搞無政府主義；必須考核利潤指標；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平均主義；努力造就一支又紅又專的宏大的技術幹部隊伍；實行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必須下放權力，分級管理同加強計劃管理結合起來等。這些對經濟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第四，從根本上扭轉了“文化大革命”摧殘科技和教育的狀況。1977年8月中央召開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提出尊重腦力勞動、尊重人才的口號，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採取了穩定教學秩序一系列的措施，教育開始步入正軌；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重視。為加強全國科學技術工作的領導，1977年9月成立國家科委，1978年3月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大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

第五，在認識上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引進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並且制定了龐大的引進計劃，把加快經濟發展建立在大規模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的基礎上。從體制改革角度看，這次大規模引進國外技術設備的行為還未能稱之為對外開放，但是與“文化大革命”中走到極端的閉關自守的做法已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因此，1976年作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下限、新的歷史時期的上限，其具體的日期可以劃在1976年的10月。

## 2. 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階段

農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進一步堅定了改革的信心，企業改革經過幾年的試

點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經驗，改革已經得到全社會贊同，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但是由於舊體制的巨大慣性，新舊體制在交替和轉軌中充斥着尖銳的衝突。

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是：

第一，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發展，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突破了以前把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觀念。這就為改革的全面推進開闢了道路。

第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由於城市是社會經濟的中心，它的改革涉及到經濟的所有方面，因此，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全面推進階段，構建市場主體和培育發展市場體系成為改革的中心。

第三，經濟體制改革是以政府推動為主，並且有了比較明確的改革目標，有了基本的改革戰略。

第四，經濟發展進入耐用消費品拉動階段，經濟結構有了較大的變化，要求提出產業政策並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

第五，國民經濟迅速增長，長期以短缺為特徵的供求關係發生了大的轉變，甚至出現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次社會性的商品供過於求即市場疲軟的現象。

### 3.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

鄧小平自改革之初便多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但他的觀點並沒有廣泛地為人們所知曉，在論爭中，主張搞市場經濟的觀點仍未取得共識。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白無誤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以後，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景豁然開朗，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有了明確的結論。鄧小平的講話之所以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表現出領袖人物的睿智在歷史發展轉折關頭的關鍵性作用，同時也說明改革的潮流已經積聚了多麼巨大的能量，二者的結合就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強大動力。

自此，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完成了目標模式的確立和新的經濟體制框架的構建，開始了在明確目標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工作。

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是：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到全黨全國人民普遍認同，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目標和體制框架十分明確的前提下進行的。

第二，開始重視經濟發展中的知識因素和人與自然的關係，提出並開始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第三，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出現全面的商品供過於求的現象，買方市場已經形成。

第四，以間接的經濟手段爲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基本建立起來。

大多數國家的市場經濟都是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的建立是自發的，並在處理和解決反復出現的經濟大波動中逐漸形成了宏觀調控機制。因此，現代市場經濟是宏觀調控與市場競爭的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走的是與其他國家不同的道路，中國沒有經歷過長期發展的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所面對的前提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因此，改革計劃經濟體制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近乎同一個過程。在這又破又立的過程中，具有許多不定的變數，即使有了明確的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是複雜和困難的，而且要經歷很長的一段時期，即是說，1999年只是我們寫作這本書的下限，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階段的下限。

歷史過程可以在書本上劃出時期、階段，分出章、節，但在現實中卻是一個綿延不斷的過程，今天是昨天的繼續，又是明天的起始。因此，割斷歷史、孤立地作出判斷是不可取的。觀察和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經濟事件，不僅要從當時的效果着眼，而且必須從它與其後的歷史發展的聯繫着眼。作爲身歷其境的當代人仍在不斷延伸的當代歷史之中，在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思考和對歷史素材的分析運用時，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的限制，認識總會有局限。我們相信，隨着歷史的向前推移，我們的知識和經驗將變得更加豐富，將具有更高的認識和判斷力去提高我們對經濟史的分析水平。

# 目錄

## 上卷

---

### 前言

1

---

## 第一編 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 ( 1949年～1956年 )

### 第一章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起點

3

---

##### 第一節 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

4

###### 一 獨特的經濟結構

5

###### 二 低下的經濟水平

12

##### 第二節 新中國建立前夕的經濟狀況和基本政策

14

###### 一 新中國建立前夕國統區的經濟狀況

15

###### 二 新中國建立前夕解放區的經濟狀況

18

###### 三 新中國建立前夕的基本經濟政策

21

---

### 第二章

#### 確立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

28

---

##### 第一節 國營經濟的建立

28

###### 一 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

29

###### 二 沒收官僚資本

34

###### 三 國營經濟的建立和發展

36

##### 第二節 穩定市場和物價

38

###### 一 市場物價的嚴重動蕩

38

###### 二 引起物價波動的原因

39

---

|                     |    |
|---------------------|----|
| 三 穩定市場物價的鬥爭和成效      | 40 |
| <b>第三節 統一國家財政經濟</b> | 43 |
| 一 統一國家財政管理的決策       | 44 |
| 二 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的成效       | 46 |

### 第三章 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調整 50

|                          |    |
|--------------------------|----|
| <b>第一節 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調整</b> | 50 |
| 一 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遇到的新困難        | 50 |
| 二 調整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部署         | 53 |
| 三 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調整          | 56 |
| 四 調整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成效         | 61 |
| <b>第二節 “三反”、“五反”運動</b>   | 62 |
| 一 “三反”運動                 | 62 |
| 二 “五反”運動                 | 66 |

### 第四章 新解放區的土地制度改革 72

|                           |    |
|---------------------------|----|
| <b>第一節 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準備</b>    | 72 |
| 一 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前的狀況            | 73 |
| 二 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各項準備           | 74 |
| <b>第二節 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成就</b> | 82 |
| 一 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開展和順利完成        | 83 |
| 二 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成就             | 85 |

### 第五章 國民經濟的恢復 89

|                         |    |
|-------------------------|----|
| <b>第一節 抗美援朝對國民經濟的影響</b> | 89 |
|-------------------------|----|